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1928—1949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

夏文华 著

STUDY ON THE COMMUNITY OF SCIENTIFIC
CULTURE IN MODERN CHINA(1928-1949)
——AN INVESTIGATION FOCUSED
ON ACADEMIA SINIC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

1928—1949

——以中央研究院为考察中心

夏文华 著

STUDY ON THE COMMUNITY OF SCIENTIFIC
CULTURE IN MODERN CHINA(1928-1949)
——AN INVESTIGATION FOCUSED
ON ACADEMIA SINICA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1928 - 1949：以中央研究院为
考察中心/夏文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3

ISBN 978 - 7 - 5161 - 9937 - 4

I. ①中… II. ①夏… III. ①科学技术 - 文化研究 - 中国 -
1928 - 1949 IV. ①G32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196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5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80.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16BZX029）阶段性成果

序

张培富

科学建制和科学文化是构成现代科学的重要社会形态，其中，科学建制既是人类科学活动不断制度化的结果，又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通过建制化而产生的专业科学社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出版物、科学教育制度，以及科学奖励和资助制度等，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结构和运行的基本要素。科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科学的建制化而逐步形成并为社会所接受的新型文化，是科学活动的价值、精神和规范在人类文化中的合法呈现和外化。科学文化的发展不仅对人类的一般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改变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结构，同时也反过来强化了科学建制的合理性。对科学建制和科学文化的考察涉及科学如何在社会中形成、科学如何独立地运行和发展以及科学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变迁等基本的元科学问题，是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等研究领域的兴趣焦点，因而开展针对中国科学建制和科学文化关系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的科学建制产生于近现代的社会变革运动，既有直接移植于意、英、法、德、美等国科学建制的模式，也有依据国情和需要加以创新的内容。可以说，一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就是一部中国科学建制史。伴随着科学建制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现代科学建立起了完整的学科学术体系，取得了重要的科学成就，在世界科学之林占据了一席之地。事实证明，中国科学从无到有、从初建到繁荣发展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科学事业本身，它不仅具有持续提升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和教育等国家实力的功能，还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和作用，对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中国科学建制的发展，考察中国科学文化的建设，是避免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地位与作用作空泛判断的一条有效途径。尽管所谓“西学东渐”一开始就包含着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传播，但如果没有本国科学建制的

形成，就不能保证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存在，中国科学的真正发展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科学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正是随着中国的科学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零散到规范，中国的科学文化才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开展中国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对于构建中国新的文化思想体系，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大有裨益。

在过去关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研究中，国内外学术界已对中国科学建制的形成和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但这些研究总体上是分立的，尚缺乏关于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互动关系的深入探讨。夏文华博士的《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正是一部将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的互动结合起来的科研成果。该书以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人物为核心，构建了“科学文化共同体”，对共同体的形成作了社会学分析，并对共同体的学术示范与文化影响力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述，通过研究较好地诠释了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2004年跟随我读研究生算起，夏文华接触科学文化这一领域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他完成了硕士、博士的学业，也完成了从一个文学学士到哲学硕士再到科技史博士的转变，多学科的背景使他能够从不同研究领域吸取养分，从而找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治学路径。“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构建正是得益于他在不同学科之间广泛的阅读与思考。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送交匿名评审时，外审专家给予这一选题充分肯定评价，认为该选题“具有开创性”，其学术思考是“新颖的、有价值的”，而且“以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为案例的论述是合适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其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价值。我认为匿名评审专家的评价是中肯的，符合夏文华当初选择这一选题进行研究的初衷，其研究结果也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当然，“科学文化”或“科学文化共同体”这一研究领域是极其宽广的，在一篇博士论文或是一部著作当中是不可能把相关问题完全研究透彻的。“科学文化共同体”涉及的人物、机构和思想十分繁富，时间跨度也很长，仅仅以某一时段某一核心机构为案例进行论证，似乎不足以充分反映科学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变迁与重大影响。好在，夏文华博士打算在这一领域长期地钻研下去，并尝试将“科学文化共同体”的研究在时间维度上向前推进、向后延伸，即从“现代”向“近代”和“当代”拓

展，研究对象也尝试触及学术精英之外更广泛的群体，从而构建“科学文化共同体”在中国产生、发展的完整图景，充分挖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使之具备一定的普适性。

夏文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形成的书稿，即将出版。经过四年多的沉淀、反思和删改，其立意当有所提升。作为他的指导教师，我乐观其成，也希望他能借此书的出版，对过去十多年的学术思考作一总结，并继续在“科学文化”这一领域钻研，争取早日取得新的成果。

引 言

20 世纪以来,科学的概念和思维习惯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人们对社会的理解,科学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不仅是知识体系,更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有效性,融入社会各个领域,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由于“科学”在现代中国扮演的极为特殊的角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科学文化。科学在现代中国社会当中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科学文化逐渐成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科学”已超越其本身的价值,成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标杆。因而,对“科学文化”的研究已成为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笔者在综合考量了各种研究之后,尝试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试图将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纳入共同的研究主体,从而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做出全面完整的理解。

一 选题目的与意义

(一) 选题目的

笔者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①这一概念,试图从两种文化分离的源头来寻求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构建科学文化中的融合。如果说现代中国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主要由科学共同体完成,那么,现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塑型则是由包括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在内的科学文化共同体建构完成的。科学文化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文化共同体把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结合成一个功能整体,大大地推动了

^① 本文中的“现代”与社会史、政治史中“现代”的意义不完全一致,虽然本文也以历史时期来划界,但本文所指的“现代”主要是从“现代性”的意义上来使用它。现代性一般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形成;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社会文化的发展。因而,科学文化共同体的意义和作用应该是科学发展、文化发展进程中需要深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书的主旨在于弥合这一研究对象的隔阂,试图通过提出一个“科学文化共同体”,把塑造科学文化的主体人员统摄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科学文化——的群体,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如实呈现科学文化塑型过程中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各自的贡献,揭示科学文化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本书提出科学文化共同体,最大的目的是尝试把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纳入同一个研究群体,进而阐释他们在科学文化发生、发展、传播中的共同作用。

(二) 选题意义

本选题在提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时,以中央研究院这一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为核心,以其职员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做具体而系统的实证研究,用具体的考察代替空泛的论断。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在中国现代科学建制的建立和科学文化的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对现代科学事业起到了示范作用,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选取中央研究院这一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科研机构进行研究,探讨中国科学建制与科学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相互作用关系,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对于构建中国新的文化思想体系,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大有裨益。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囊括了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职业科学家,在20年的历程中,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它还担负着指导、联络、奖励国内学术研究的任务,在决定国家学术研究方针政策、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研究院最初的20年曲折发展,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艰难奋进的缩影。中央研究院在中国现代科学建制的建立和科学文化的建设中做出了突出的成就。鉴于中央研究院在民国时期不可替代而又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使得对中央研究院发展历程的研究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也成为民国史研究特别是民国科学史研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自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特别是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十年间,在中央研究院的组织带动下,全国的科学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种科研机

构、科学团体、科学刊物纷纷问世，出现了科学文化繁荣的局面。在科学建制化的过程中科学文化也逐渐成型并通过各种途径深入民众之间，确立了科学文化作为现代社会文化主流的地位。“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科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离不开社会支撑物，而科学建制恰是科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物。科学文化是伴随科学的建制化而逐步形成并为社会所接受的新型文化，是科学活动的价值、精神和规范在人类文化中的合法呈现和外化。科学文化的发展不仅对人类的一般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改变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结构，同时也反过来强化了科学建制的合理性。对科学建制和科学文化的考察涉及科学如何在社会中形成、科学如何独立地运行和发展，以及科学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变迁等基本问题，因而是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兴趣焦点。

中央研究院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科研机构，在体制与文化上的探索对现代科学事业起到了示范作用，更因为它与国内外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间的密切关系，其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全面深入考察之后，发现中央研究院客观上就是以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与科学共同体相比，科学文化共同体容纳的成员更多，它不仅包括科学家，举凡对科学文化的发生、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人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纳入科学文化共同体。

科学文化共同体范式所体现的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推动现代中国科学前进的思想框架。其范式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规范系统为其成员所接受，同时又反过来制约、影响着他们的认识活动。科学文化共同体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影响能量，宣扬了科学精神、深化了民众对科学文化的普遍认同，营造了科学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氛围，重建了以科学文化为核心的新型文化，树立了新的世界观和科学信仰，冲破旧观念，打开新思路，推动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

从科学文化共同体的视角来考察现代中国科学、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对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文化学观照，既是对现代科学史研究做深广拓展的一种尝试，同时对整个现代科学史的研究新格局的形成也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深入研究现代中国科学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对科学事业的推进、对科学文化的塑型之贡献，既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现代中国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也能对当前科学事业的规划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 研究现状与问题

由于本书提出的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是以中央研究院的职员为成员,因而本书的所有研究都是以中央研究院及其成员的科学文化实践而展开,主要是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现状进行考察。

(一) 对中央研究院进行研究的现状

1. 中国大陆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

中国大陆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包括 1949 年前的研究和 1949 年后的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研究内容主要有对中央研究院的整体研究、研究所的研究和学者的传记研究三个方面。

(1) 对中央研究院的整体研究

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央研究院发展过程中,作为创建者和领导者的蔡元培即随时对本院的科学事业进行总结和探讨,如《中央研究院之过去与将来》(1934),《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概况》(1935),《中国的中央研究院与科学研究事业》(1936),《二十五年来中国研究机关之类别与其成立次第》(1936)等。民国时期发表的这些文章是当时对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的总结,也是现今研究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文献。

1949 年之后,中国大陆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中断,重新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的论文是傅长禄发表于《史学集刊》1982 年第 2 期的《蔡元培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它揭开了中国大陆新时期研究中央研究院的序幕,引发了其他学者研究的热情。稍后几年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前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和重要制度》(孔庆泰,1984),《中央研究院机构沿革大事记》(樊洪业,1985),《中央研究院概述》(林文照,1985),《中央研究院的组织与管理(1928—1949)》(夷声、歆名,1985),《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林文照,1988),《中央研究院主要法规辑录》(林文照,1988),《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任命与选举》(樊洪业,1990)。林文照、樊洪业等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这些论文初步讨论了中央研究院建立的缘起、组织原则与形式、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科研奖励、法规、人才培养等内容,对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功绩做出了客观的

评价。

徐明华较早从中国现代科学体制化的视角对中央研究院进行研究，认为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是“我国政府办科学的开始”，“实现了科学活动从业余到专业的转变”，“科学事业成为政府事务中的一部分”。这种官办集中型的中央研究院是科学界和政府的必然要求和选择，国家科学体制“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符合中国社会集权专制的传统结构模式”，在稳定的环境下能够取得可喜的成就，但“容易导致科学自主性的破坏”^①。

张剑的《中国学术评议空间的开创——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为中心》和左玉河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探讨了中国学术评议空间开创过程中的得失，认为尽管民国科学体制化走的是政府化的道路，仍存在一定的学术自由空间，“中央研究院通过建立和完善评议会制度，真正实现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所赋予其之‘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使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体制化。”^② 段治文亦认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形成标志着官办集中型科学体制的正式形成，奠定了中国科学体制的基础。

段异兵、樊洪业通过考察 1935 年中央研究院科研选题的转变，认为此前中央研究院的选题多依据学者个人兴趣及见解而自由选定，此后则转向解决“实际急需问题”，标志着中央研究院“除研究纯粹科学之学理外，同时积极研究科学之应用”；作者认为这种转变“是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在中国本土化的要求”^③。孙宅巍对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的机构迁徙、人员流动、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央研究院的西迁，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在战火中为国家基本完整地保存了这一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包括人员、重要资料、仪器、设备等，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加速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分析中央研究院在艰苦环境中仍能取得成就的原因时，孙宅巍认为政府的重视、研究人员的爱国热情、战争的客观需要、国际学术团体的支持等起到了重

① 徐明华：《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2 期下）1983 年。

② 左玉河：《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史学月刊》2008 年第 5 期。

③ 段异兵、樊洪业：《1935 年中央研究院使命的转变》，《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 年第 5 期。

要作用。^① 张凤琦着重总结了中央研究院在抗战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在应用科学研究上作出的重要贡献,认为当时科学家们普遍认同“科学研究绝无纯粹平常与应用科学的严格区分,二者彼此渗透,相辅相成”^②。

郭金海认为,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典范”,“是现代科学建制化历程开始步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③。《1940年的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张剑,1999)、《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之争》(雷颐,2007)、《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1940年会与院长选举》(王扬宗,2008)、《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周雷鸣,2006)等文通过考察院长与院士的选举,探讨在中央研究院这一科学研究机构中学术与政治间的制衡与博弈。此外,诸如《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董光璧,1997)、《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杨德才,1996)等科技史通论著述中均有论及中央研究院与民国科技发展的关系。

(2) 对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研究

1937年刘咸选辑的《中国科学二十年》一书,收录了严济慈、曾昭抡、胡先骕、卢于道、吕炯等知名科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1937年之前20年间中国科学的发展分门别类作了总结,其内容包罗物理、化学、生物、天文、气象等科学分支学科,无异于一部中国科学断代史,该书对各个学科在建制和学术上的成就做出了梳理与评价,内容多涉及中央研究院各所及研究人员。1945年吴学周撰成《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一文,主要记述化学研究所在1928—1945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1949年,留在大陆的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整合建立了中国科学院,中央研究院原来的机构从体制意义上不复存在,有必要对之前的工作做一个总结。为此,1950年第1期、第2期的《科学通报》上,集中发表了《解放以后的前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王伏雉)、《解放前后前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概况》(陈彪)、《前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四月份工作报告》(吴学周)、《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近况》(张文佑)、《前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解放后工作概况》(李寿枬)、

① 孙宅巍:《抗战中的中央研究院》,《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张凤琦:《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中央研究院》,《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文化教育科学编),1996年版,第743页。

③ 郭金海:《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

《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最近工作报导》(章震樾)、《前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最近动态》(伍献文)、《解放后的前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徐晓白)、《前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近讯》(柳大维)、《解放以来的前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胡旭初)等文章,可视作对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1949年以前历史的总结。

1980年代之后,学术界恢复对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关注,研究的论著主要包括亲历者对研究所的回忆,以及对历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研究多集中于地质、天文、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发展较好的研究所。如陈遵妫的《对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筹建及建设紫金山天文台的回忆》(1988)、吴文俊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一年的回忆》(1989)等。王仰之的《中国地质学简史》(1994)中有《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节,详细记述研究所机构设置、人员、经费、研究方向、成果及出版刊物等情况,内容翔实。近年来对中央研究院各所的研究有所深入,胡升华对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沿革、工作范围、研究人员状况、研究工作进行了梳理,肯定了物理研究所作为中国第一个物理学研究机构,为物理学在中国的兴起、研究队伍的培养等方面做出的功绩,但认为物理所的“研究事业发展缓慢”,“显得有些零乱、随意,很难看出有明显的特色,缺乏有计划的、系统的研究”^①。袁振东通过对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设立的动因、经费的拨给、设备的扩充、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等内容的微观考察,探讨中国现代化学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科学体制化问题,认为“中研院化学所的创建是职业化化学研究在中国的一次成功的尝试”^②。李惠兴对天文研究所成立的原因、时机,天文台的选址及建造中遇到的经费缺乏、驻军干扰等困难做了分析,并专章分析天文研究所的领导者高鲁和余青松对天文台的贡献。全文着力阐述民国时期的科学发展受政治支配的主旨,认为天文研究所的成立主要是政治的需要和少数学者努力的结果,“在一开始就打上了‘政治’的烙印,成为政府的工具”,

① 胡升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评述》(1928—1949),《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文集》,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349页。

② 袁振东:《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的创建(1927—1937年):职业化化学研究在中国的尝试》,《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年第2期。

“科学也成了政治的奴仆”^①。陈紫微通过对社会研究所的学术成果、特色、范式进行考察,认为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法紧跟世界趋势,研究内容多与社会现实契合,从经济研究入手,将实地调查资料与史料并重,着眼于现实问题,使学术成果直接为社会服务,其目的缘于为国家探寻出路;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具有学术和社会双重贡献。^②

(3) 对中央研究院学者的传记研究

对中央研究院学者的个案研究主要以传记的形式出现,这是研究中央研究院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早期胡适、傅斯年等人发表的对丁文江的回忆文章《丁在君这个人》(1936)、《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1936)等。随着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深入,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科学家传记,如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赵忠尧、严济慈、吴学周、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竺可桢、侯德榜、茅以升、童第周等人先后有一种或多种传记问世。这些传记记述了科学家们的科学历程,虽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会涉及他们在中央研究院时的经历。

一些科学家传记以年谱的形式面世,如《李四光年谱》(1999)、《黄汲清年谱》(2004)、《翁文灏年谱》(2005)、《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2008)等,其中《翁文灏年谱》、《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为近年科学家研究年谱类的精品。李学通所作《翁文灏年谱》颇得作年谱的家法,取材谨严,剪裁有度,以谱主的学术成就为主线,对其他各类材料尽可能兼收并蓄,既有中国地质事业大事的记载,又有其政治、军事背景的交待,挖掘出不少新材料,订正了此前的错误,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脉络清楚、材料翔实的研究平台。《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的作者胡宗刚长年潜心研究静生生物调查所,所撰胡先骕年谱,资料丰富,考证翔实,大部分资料为首次呈世,对中国生物学史研究者而言,该书有着极高的价值。

中央研究院科学家传记研究除个人传记外,还有集体传记研究方式。当前的科学家集体传记研究主要有两种进路,一是对同一时代科学家的共时研究,一是对某一学科科学家的历时研究。前一种进路如:段治文的

^① 李惠兴:《有关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建立初期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科学院,2006年,第45页。

^② 陈紫微:《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探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第33—36页。

《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2001)，该书部分章节探讨了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特色科学体制的形成，并采用集体传记研究的方法对20世纪20—30年代科学家的学科分布、年龄结构、籍贯分布、留学经历等进行社会学分析，把这个时期的科学家称为“第三代科学家”，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家群体”，并认为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职业化完成，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后一种进路如：张培富的《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2009)，该书从化学留学生（中央研究院从事化学研究的人员基本属于此群体）的群体指标分析入手，探讨了留学生在中国近代化学社团、化学期刊、化学教育、化学研究机构等体制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其研究思路为体制化与中国近代科学之间的复杂互动，在同类研究中尚不多见。这两种研究进路均以科学家集体传记的方式对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作了微观考察、整体描述，可谓各具特色，殊途同归。

2. 中国台湾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

1949年，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迁到台湾，在艰难中维持，并力图恢复。由于“中央研究院”在台湾的重建，对它的历史研究也是台湾学者的长久关注点。他们的评论基本是一以贯之，不曾有昨是今非的骤然转变。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物研究，如胡适于1956年完成的《丁文江的传记》，是他晚年最重要的研究著作之一，兼具史料的一般功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陶英惠所作的研究很具代表性，其重要的研究成果有：《蔡元培与大学院》(1972)，《蔡元培年谱》(1976)，《蔡元培的生平与志业》(1977)，《蔡元培》(1978)，《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1978)，《蔡元培1868—1940》(1984)，《王世杰1891—1981》(1988)，《朱家骅1893—1963》(1996)，《深谋远虑奠磐基：朱家骅与中央研究院》(2000)等。在这些论著中，阐述了蔡元培等学术领袖对中央研究院发展的功绩；对比了“中央研究院”与其他国立研究机关、大学研究机构之异同；认为“由于国家多难，政府经费支绌”，各机关均缩减经费，“学术研究机关若无基金，则进行必难稳定”，“中研院各所的设备，以及举办的特种事业，有赖于基金利息之补助者亦多”；充分肯定蔡元培等人教育独立、学术自由

的思想使中央研究院具有“独立超然的地位”^①。王汎森的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傅斯年：中国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2000) 树立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典范——通过把握个体生命进而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脉搏；作者将历史与政治看作理解长期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的一生的关键因素，通过傅斯年的生命揭示出的是个体生命消解于历史理想与现时政治的夹缝中的过程。^② 吴大猷的《八十述怀》(1987)、《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2001) 等著作，回顾了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发展，对叶企孙、饶毓泰、赵忠尧、吴有训、严济慈等学术骨干的贡献做出客观评价，认为“中国在 20 世纪的头个 50 年，(在物理学上的) 最大的成就，就是的确确实训练出来有十几二十位很好的学生”。^③

3. 海外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央研究院整体研究取得的成果以陈时伟 (Shiwei Chen) 为最佳。陈时伟在“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27—1949” (《民国时期的政府与学术：中央研究院的历史 (1927—1949)》, 1998)、《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 1927—1937》(2003) 等文中阐述了国民党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分析了国家科学体制模式的选择与确立，探讨了科学家职业化与职业科学化对中国近代科学体制的影响。陈时伟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论及整个近代中国学术体制的转型，从中央研究院的地位、组织结构、人才构成等方面作了分析，认为中央研究院这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和民国政治相结合、超然于各国立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之上的机关，为近代职业学术研究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提供了体制空间。^④

(二) 对中央研究院进行研究存在的不足

尽管学界对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取得诸多重要成就，但其存在的不足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包括研究空白点的填补、研究视野的扩展、研究平

① 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 (1927—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1978 年。

② Axel Schneider. Book Reviews. *The China Quarterly*, 2001 (1): 1040—1041.

③ 吴大猷：《早期中国物理发展的回忆·续三》，《物理》2005 年第 4 期。

④ 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 1927—1937》，《中国学术》2003 年第 3 期。